

# 在紫禁城，寻找“消失的万历”

■郝双双



紫禁城的空间设计本身就蕴含着严格的等级秩序。视觉中国供图

## 透过小小的贺年片，看见大时代的背影

贺年片作为一种表达新年祝福、传递友情的信物，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，它始于唐，兴于宋，流行于明清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贺年片风靡中国大学校园，成为传递情谊与时代风貌的独特载体。

刘宇、潘妍编著的《朋友，新年进步：贺年片上的中国大学（1952—1988）》首次将中国高校贺年片这一时代产物的图像集结成册，以珍贵独特的贺年片图像资料，记录着一段不寻常的中国院校变迁历史。这些大学贺年片，就像是一个个历史碎片，不仅折射了中国教育的发展，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。

《朋友，新年进步》不仅收藏了国内大学在1952年至1988年这一时期的贺年片，还收集了学校画刊、招生简章、毕业纪念册、奖状、文艺演出邀请函等资料5000余件，并从这5000余件收藏中，精选出500余张贺年片，作者围绕全国院系调整这条主线，通过对这一时期贺年片的解读，把贺年片本身的信息、学校变迁的节点有机地连接起来，扩大了本书的想象空间。

另外，作者对大学办学体制、文化传承有较为完整的了解，并通过每份材料的细致挖掘，真实可感地展现了彼时大学生们的理想抱负、关心激励和惜别感伤，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时代特写。

该书可以说是一本20世纪中国大学风貌的珍贵图鉴，贺年片中不仅蕴藏着丰富的时代记忆，还包含着大量鲜活的生活瞬间：从地质勘探到戏剧展示，再到校园足球赛，这些贺年片承载起四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。

在内容上，这些贺年片有着反映时代特点的共性，如画面中描绘的卫星上天、巨轮下海、烟花飞溅、五谷丰登……这些贺年片也体现了不同院校的专业特性与个性表达，例如，地质院校的勘探现场，航空院校的飞机展示，邮电院校的微波发射，文艺院校的演出剧照等，既体现了各类院校的学科建设成果，也构成了独特的视觉符号。可以说，这些贺年片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审美与时代变迁，还深刻体现了各大学的独特气质，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新中国教育发展史的独特视觉档案。

在结构上，本书大体分为工学、农学、新中国的新大学和其他大学四个部分。“工学”和“农学”部分体现了院系调整背景下，中国高校20个重点学科的建设历程，侧面反映了时代发展特点；“新中国的新大学”简要梳理了1949年后15所中国大学的建设和变迁，并通过百余张贺年片体现了当时的校容校貌；“其他大学”则讲述了工学和农学之外的专业大学和特色大学建设。

在电子通信瞬息万变的今天，贺年片早已退出了我们的生活。但也正因如此，这部集结了近四十年贺年片的图鉴，才显得尤为珍贵。它不仅是一部中国大学的视觉变迁史，更是一代代学人精神气质的生动见证。那些手写的祝福、那些朴素的设计、那些带着时代烙印的图案，都在提醒着我们：在信息传递变得无比便捷之前，人们曾如何郑重地、一笔一画地传递着情感与祝愿。

《朋友，新年进步》的独特价值，正在于它将这些历史的碎片悉心收拢，让我们得以透过小小的贺年片，看见一个大时代的背影。

《朋友，新年进步：贺年片上的中国大学（1952—1988）》刘宇 潘妍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生在毓德宫西室，临终托付发生在乾清宫弘德殿……当这些都写入叙事，宏大的政治叙事便落回到了可想象的物理场景。

这就像画地图：先标出枢纽，再画出路径，最后才谈支线。而一旦这张“基准地图”完成，紫禁城的意义就被整体抬升。它不再只是三大殿的宏伟，也不再只是“帝王之家”的符号，而是一座巨大住宅与等级机器：空间分配秩序森严，谁往中路、谁往东西路、谁能到哪里、谁在哪里发生，也无法判断同僚是否掌握了更内圈的消息；于是政治判断越来越依赖传闻、揣测与站队。

可以说，在这本书中，空间分析成为一把钥匙，既重塑了旧叙事的内在肌理，又发掘出被传统史观遮蔽的新议题。空间把人聚拢在同一处，也把不确定的性压到同一处：你越靠近那道关不上的门，你越感到门内发生的一切不可见、不可控。

### 让沉默的宫殿开口说话

在关于紫禁城的传统叙事中，皇帝与空间的关系往往是模糊的。本书如同高精度测绘，精确标定了万历在其生命各阶段的空间坐标。

在本书中，作者靠的是“笨功夫”，他追踪与定位其具体的空间位置，如居住轨迹从裕王府到乾清宫、毓德宫、养心殿、启祥宫再回乾清宫，如统计其“亲临文华殿”的次数与热情衰减曲线等，这些看似细碎的数据与路线，实则是在绘制权力运行的主干道。

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把许多政治事件重新锚定到具体房间：例如父子沟通发生在启祥宫后殿西暖阁，关键对话发

乎机械的“等待状态”，空间通路的僵局最终导致了政治管理的僵局。

而一旦“等待”成为常态，情绪就会沿着空间扩散、沉积，并反过来塑造政治行为：官员们意识到危机，却无法进入皇帝寝宫，只能聚集在“朝房”这种位于宫内、却仍然隔着层层门禁的中介空间里私下议事，试图以集体聚集来重建中枢联系。书中指出，《万历起居注》里“朝房”的记载在万历中后期集中出现，恰恰对应皇帝“物理失联”的时期。

这意味着朝房不只是一个办公地点，它是一种情绪容器——焦虑在这里被放大，等待在这里被制度化，猜测在这里被反复生产。因为在“留中”的机制下，信息不再按照既定节奏流动，官员无法判断奏疏是否送达、皇帝是否阅读、批红何时发生，也无法判断同僚是否掌握了更内圈的消息；于是政治判断越来越依赖传闻、揣测与站队。

可以说，在这本书中，空间分析成为一把钥匙，既重塑了旧叙事的内在肌理，又发掘出被传统史观遮蔽的新议题。空间把人聚拢在同一处，也把不确定的性压到同一处：你越靠近那道关不上的门，你越感到门内发生的一切不可见、不可控。

在关于紫禁城的传统叙事中，皇帝与空间的关系往往是模糊的。本书如同高精度测绘，精确标定了万历在其生命各阶段的空间坐标。

在本书中，作者靠的是“笨功夫”，他追踪与定位其具体的空间位置，如居住轨迹从裕王府到乾清宫、毓德宫、养心殿、启祥宫再回乾清宫，如统计其“亲临文华殿”的次数与热情衰减曲线等，这些看似细碎的数据与路线，实则是在绘制权力运行的主干道。

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把许多政治事件重新锚定到具体房间：例如父子沟通发生在启祥宫后殿西暖阁，关键对话发

生在毓德宫西室，临终托付发生在乾清宫弘德殿……当这些都写入叙事，宏大的政治叙事便落回到了可想象的物理场景。

这就像画地图：先标出枢纽，再画出路径，最后才谈支线。而一旦这张“基准地图”完成，紫禁城的意义就被整体抬升。它不再只是三大殿的宏伟，也不再只是“帝王之家”的符号，而是一座巨大住宅与等级机器：空间分配秩序森严，谁往中路、谁往东西路、谁能到哪里、谁在哪里发生，也无法判断同僚是否掌握了更内圈的消息；于是政治判断越来越依赖传闻、揣测与站队。

可以说，在这本书中，空间分析成为一把钥匙，既重塑了旧叙事的内在肌理，又发掘出被传统史观遮蔽的新议题。空间把人聚拢在同一处，也把不确定的性压到同一处：你越靠近那道关不上的门，你越感到门内发生的一切不可见、不可控。

在关于紫禁城的传统叙事中，皇帝与空间的关系往往是模糊的。本书如同高精度测绘，精确标定了万历在其生命各阶段的空间坐标。

在本书中，作者靠的是“笨功夫”，他追踪与定位其具体的空间位置，如居住轨迹从裕王府到乾清宫、毓德宫、养心殿、启祥宫再回乾清宫，如统计其“亲临文华殿”的次数与热情衰减曲线等，这些看似细碎的数据与路线，实则是在绘制权力运行的主干道。

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把许多政治事件重新锚定到具体房间：例如父子沟通发生在启祥宫后殿西暖阁，关键对话发

母后李太后与权臣张居正的双重注视下，被密集的日讲、经筵训练成“理想圣君模板”。他像一位“被过度期待的天才少年”，早期勤奋，随后厌倦。

真正的转折，出现在他对教材的公开质疑：当他激烈批判《贞观政要》的政治伦理、坚持改用《礼记》，并由此拒绝再去文华殿时，他似乎明确地意识到，自己所学的“道理”也成了约束自己的工具。

除了学业，制度也剥夺了他在亲密关系中的自主性。万历的婚姻完全由两宫太后安排，他甚至在结婚当天第一次见到皇后王氏；繁复礼仪更像国家典礼，而非个人的结合。万历的情感，只能寄托于尚能自主的缝隙之中，他对郑贵妃的偏爱，便是其一。这既是个人情感的流露，也成了点燃政治风波的火种。所谓国本之争，从此不再仅是朝堂的党争议题，更是一个人试图将私爱置于制度禁区之上的无奈抉择。

骨肉分离的祖制，亲密关系的不断切断，把这种帝王的孤独推向极致。而他对寿宫选址的执着（反复勘选、亲赴天寿山、争执不休），就像是在生命的尽头争夺一点“可掌控的疆界”。他无法按心意立储，也无法留住亲人，于是把对永恒与控制的渴望，投射到死亡空间，那几乎是他唯一能相对做主的地方。

最后，“归于尘土”让皇帝彻底从“天子”还原为“人”。在这里，“三十年不上朝”不再是一个道德故事，而像一场长期、沉默的罢工：当所有积极反抗都被视为失德并被压制，退回私人空间、以“不作为”守住最后的自我边界，成为一种疲惫却可理解的选择。

### 一套由“门”控制的系统

本书更具突破性的，是把紫禁城还原成一套由“门”这一空间节点控制的“刚性的物理系统”。关于门禁的

规则不是抽象条文，而是落实在一重重“门”上：谁能到哪里，谁必须止步于哪里，谁每跨出一道门就要被登记、被验明身份，谁只能隔着门说话。

门禁就是很好的例子：外朝文官的活动边界止于思善门、宝善门，内阁辅臣虽有特权入内，但“每过一道门都有内官负责登记”；甚至太后见父亲也只能在仁德门外隔空传话。

这些细节让我们明白：紫禁城的本质，是一套用门禁与动线把等级秩序、性别界限、权力距离固定下来的刚性装置。这套装置首先确保的，是“锁住”最核心的人（皇帝），而后辐射出去以不同的方式，锁住围墙内的其他人。

在作者看来，帝国治理的本质是信息处理，奏疏是核心媒介，但信息流转并非“写好了就自动生效”，而依赖于其在实体空间网络的跑动与接力。奏疏从地方到中央，要穿越层级链条，最终通过通政司或会极门送入官城；批红后的指令再经午门、承天门送出，靠全国密布的急递铺接力传递。

在这里，“门”再次成为关键：文书在何处接收、由何人传递、经何门出入皆有严格规定，这意味着任何一道门的关闭、阻滞或拖延，都等同于帝国“神经系统”的局部瘫痪。所谓“治国”于是被落实为对一系列建筑节点与跑动效率的管理；政治不再只是理念冲突，也是通道管理。

当这套“物理制度”被建立和运行起来，我们才真正看懂“皇帝急政”何以会变成全国的情绪结构。

在空间视角下，万历的“急政”并非单纯的态度与品行问题，而是一次对信息系统的人为切断：他不仅从朝会空间（皇极门一带的公开政治舞台）消失，更关键的是，他中断了位于养心殿、启祥宫等私人住所内的信息处理流程。于是“留中不发”变成了一种非常具体的空间结果：奏疏的物理流动在司礼监文书房或御前停滞，原本应该被批红、被回路送出的指令，被卡在宫城内部的某个节点上。皇帝作为帝国信息处理终端的“离线”，就这样把整个系统拖入一种近



空间如何形塑权力运行，是今天理解组织与治理的重要视角。万历皇帝身居紫禁城，近三十年不临朝，却仍能维系王朝运转，这一历史现象引人深思：一座宫殿的空间秩序，究竟如何影响着帝王的执政与王朝的运行？

徐腾所著的《万历的紫禁城》恰好回应了这一疑问。作者跳出传统史观，将紫禁城从背景拉至前台，以门廊宫阙的布局与人物动线为线索，清晰呈现出这场特殊执政状态的形成与维系，以及空间对权力互动的深层影响。

在这本书中，读者将完成一场精细的“空间侦探”，不仅看见隐匿于深宫的万历皇帝，更读懂这座皇家宫殿所承载的秩序与规则：正是这严谨有序的空间，让帝王即便长期不在朝堂，也依然身处治理体系之中，始终与朝政保持着紧密关联。

■郑静

### 把人从制度里“拎出来”

以往讲述万历皇帝（朱翊钧），我们常将他塑造成抽象的权力象征，或是简单贴上“怠政”的道德标签。但《万历的紫禁城》摒弃了这种传统史观，转而采用一种“沉浸式”的人类学观察视角，把万历当作一个有血有肉、会疲惫、会厌倦、会挣扎的个体，完成了一次对他的“叙事还原”。

书中的这种“还原”是建立在对朱翊钧私人生活的全景式复原上的，比如他住在哪里、学什么、玩什么、爱谁不爱谁、如何面对死亡等。正是这些关于生活的细节把人从制度里“拎了出来”，让读者们看到在制度压迫最具体的地方，一个人如何被塑形、如何反弹、如何最终选择沉默。

事实上，十岁登基后，万历的生活就被压缩在极窄的行动半径里：在乾清宫西暖阁与文华殿之间往返，在



《万历的紫禁城》徐腾 著 光启书局

感受阻力，在对抗中体会尊重，在极限处确认自我。然而，当算法和数据开始深度介入，这一前提正被悄然改写。

《人工智能与体育》出自DeepMind实验室研究者与体育管理学者的合写，有双重视野：既有技术前瞻的锐度，也有对产业生态的审慎思考。书中抛出的问题直指核心：那些依赖直觉、灵感和临场判断的瞬间，会不会在效率至上的逻辑中被逐步消解？

一套名为《体育哲学与体育伦理译丛》的著作，恰逢其时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由黄亚玲、蒋小杰主编的这套丛书遴选了国际学界的三部作品《人工智能与体育》《体育哲学关键问题》《公平竞赛：体育伦理学》，分别从科技冲击、哲学方法与道德伦理三个维度，回应了当代体育的核心困境。

三部书中，技术带来的冲击或许最为直接，也最为急迫。竞技体育的迷人之处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它那份不可剥夺的“属人性”——人在奔跑中

感受阻力，在对抗中体会尊重，在极限处确认自我。然而，当算法和数据开始深度介入，这一前提正被悄然改写。

《人工智能与体育》出自DeepMind实验室研究者与体育管理学者的合写，有双重视野：既有技术前瞻的锐度，也有对产业